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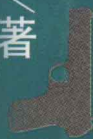
潘汉年

的★

情报生涯

PANHANNIAN DE QINGBAO SHENGUYA

尹骐／著



人民出版社

潘汉年的 情报生涯

PANHANNIAN DE QINGBAO SHENGYA

尹骐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尹 骐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01-009430-4

I. ①潘… II. ①尹… III. ①潘汉年(1906~1977)-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0076 号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PANHANNIANDE QINGBAO SHENGYA

尹 骐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194 千字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978-7-01-009430-4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 1

上 篇 初显身手

第一章 危急时刻 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 6

第二章 以血还血 严惩叛徒特务首恶 / 15

第三章 调兵遣将 在租界巡捕房收买耳目 / 25

第四章 长线钓鱼 从国民党市党部打开缺口 / 39

第五章 兵不厌诈 引诱社会局反共分子上钩 / 46

第六章 斗智斗法 巧妙反击“伍豪事件” / 58

第七章 不拘一格 建立广泛情报网点 / 65

中 篇 功“过”之间

第八章 形势剧变 重返情报战线工作 / 76

第九章 亲临一线 构建敌后情报系统 / 88

- 第十章 不惧风险 让袁殊在日本情报机构建立内线 / 100
- 第十一章 随机应变 和岩井在情报战场角逐 / 111
- 第十二章 里呼外应 把触角伸向汪伪汉奸高层 / 118
- 第十三章 八面来风 把重要战略情报源源发往延安总部 / 129
- 第十四章 香港沦陷 借助敌手实施撤退计划 / 142
- 第十五章 重心转移 进一步开展汉奸上层工作 / 147
- 第十六章 选贤任能 刺探日、蒋、汪暗中勾结内幕 / 153
- 第十七章 攻心为上 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 / 159
- 第十八章 事出意外 被挟持会见汪精卫 / 163
- 第十九章 一念之差 酿成终生苦果 / 169

下 篇 再创辉煌

- 第二十章 好事多磨 有情人终成眷属 / 180
- 第二十一章 烽烟又起 再踏上新的征程 / 189
- 第二十二章 知人善任 派遣张建良完成艰难使命 / 194
- 第二十三章 运筹帷幄 指挥杨建平开通海上运输线 / 204
- 第二十四章 胜利在望 全面担当中共代表重任 / 211
- 第二十五章 奉调新职 为情报生涯画上最后句号 / 218
- 附 录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 225

后 记 / 250

新版后记 / 252

引 子

“现在的年轻人，提起戴笠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潘汉年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在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同志，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完全不知道。也就是现在有些年轻人说的，只知道戴雨农（戴笠），不知道李克农。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宣传我们自己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前辈。潘汉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这是1996年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重要集会上，一位曾经在中央某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发言中所说的一段话。

这位老同志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把戴笠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特务魔头拿来和我们的革命家潘汉年相提并论，而只是有感于我们的宣传界和出版界在向当代青年介绍历史人物的某种偏颇和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众所周知，一部中国现代史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史。这是一部尖锐、复杂、激烈而又漫长的斗争

史。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和共产党的完全胜利,这也早已被载入了史册。在这场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中,情报和特工战线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条隐蔽战线的斗争中,最后胜负的归属也早已是尽人皆知了。但是,多年来,尤其是在实行开放政策以后的十多年来,作为败军之将的戴笠、徐恩曾、毛人凤等,都成了介绍宣扬的热点人物,尤以戴笠这个双手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历史罪人为甚。而反观作为胜利之师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如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等,他们的革命经历及其辉煌的功绩,却一直极少张扬,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历史的不公正和现实的不正常现象。

造成这种不公正和不正常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史实和相关资料,一直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保密,当然是必要的。但与此有关的制度、法规以及实施细则,却一直并不健全,很不完善,实际掌握和操作起来,便往往有很大的弹性、伸缩性,甚至是随意性。人们为减少麻烦和保险起见,这一领域几乎就成了不便涉猎的“禁区”,即使有人“冒险”去搞了,也难以顺利推出,而往往胎死于腹中。另一个原因是,隐蔽战线上的许多革命功臣与英雄人物,在经历了长期复杂艰险的斗争之后,尤其是在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却不幸在自己内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诸如整风、审干、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中,受到了怀疑、排斥、打击,以至诬蔑和陷害。在日渐严重的“左”的思潮影响下,当年这些同志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必须和敌人有所接触、有所交往、反复周旋,以及深入龙潭虎穴,“与魔鬼打交道”的各种革命行动和英雄行为,往往却成了“叛徒”、“特务”和“内奸”嫌疑的证据。这真是所谓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潘汉年就是这样一位在隐蔽战线上曾经屡建卓越功勋,而在解放后的内部肃反运动中被诬陷为“内

奸”、“反革命”的代表人物。由于潘汉年曾经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的所谓“内奸”、“反革命”罪名一经成立,同时也就株连了一大批也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战友和部下。于是,潘汉年以及和他类似的一大批受到打击和诬陷的人们,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全部斗争业绩,便长期被完全排除在一切传媒和出版物的介绍宣传之外了。

潘汉年,1906年出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从1931年起,他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转入了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副部长、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长、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主管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等高级职务。他长期战斗在敌人统治森严的后方,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屡建奇功,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大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同时还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过出色的贡献。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他在党内外乃至国内外,都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解放后,在他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改造旧上海和建设新上海而努力工作,并且取得了卓越成绩之际,突然祸从天降,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以强加的“内奸”和“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审讯、调查,长期的关押。由于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2年1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亲自点名给潘汉年定性定罪,1963年1月他被司法机关判处15年徒刑。1970年又由中央文革专案组改判为无期徒刑(连司法手续也未办)。直到1977年4月,病逝于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他被整整关押了22年。

然而这却是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1982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潘汉年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并且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潘汉年的冤案虽然已经平反多年,但是关于他的一生的丰富革命斗争经历以及蒙冤受难的种种具体情况,却仍然一直鲜为人知。其原因是:既有前面提到的属于保密方面的考虑,也有属于某些需要避讳的考虑。因为冤案的发生无疑是属于历史的“阴暗面”。

总而言之,由于上述种种可以理解和难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在隐蔽战线上曾经英勇战斗过的许多革命前辈的历史业绩,在今天的各种传媒载体中就显得十分的稀少,甚至是大量的空白。看看书市上大量反映戴笠其人其事读物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感到对革命前辈的内疚,感到某种的失职。

历史的步伐不停地前进,现在已经是 20 世纪之末了。革命前辈们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事迹,包括他们所遭遇的许多冤案,距今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有关方面对于保密的要求,也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无须回避所谓的“历史阴暗面”,已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把隐蔽战线上革命前辈们的历史业绩再现出来,使之广为传扬,重放光彩。这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对现代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就是为此而推出的一本历史纪实性的读物。

上 篇

初显身手



第一章

危急时刻 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公元 1931 年的春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多事的、艰难的、危机迭起的严峻时刻。

新年伊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钦差大臣”米夫使用秘密串联和突然袭击的手段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此次会议是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召开会议的通知既不说明会议的性质,又限定必须在 1 月 7 日这一天结束会议,以致与会者大都以为是一次临时性的紧急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并没有出席中央全会的思想准备;到会的中央委员人数也不是法定的半数以上(50 多位中委只有 22 位出席)。会议的操纵者还非法地临时决定让不是中央委员的一批与会者享有表决权。本次中央全会的唯一实质性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米夫的忠实追随者陈绍禹(王明)等人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把原先不怎么听话的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赶下台。

结果经过整整一天(15个小时)的激烈较量,米夫及其追随者们如愿以偿,王明这位唯米夫之命是从、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党棍式的人物成了中共实际上的第一号领袖人物。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给中共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

四中全会勉强通过决议的第二天,即1月8日,以罗章龙为首的中共中央部分领导成员就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的会议。要求共产国际另派代表来华指导中共的工作,另行成立中央。中共陷入了分裂的危机。

九天之后,即1月17日。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正在东方旅社集会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袭击,当场就有36人被捕,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何孟雄就是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米夫和王明的代表人物之一。东方旅社事件的发生,至今也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仍未解开的谜:国民党特务是怎样掌握了这一秘密集会消息的呢?都说是“叛徒”告密的结果,但告密者究竟是为了保全自己邀功请赏,还是出于宗派主义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的目的?众说纷纭,迄今似乎尚无定论。

严酷的事实是:20天之后,即2月7日,东方旅社被捕的36人中有24人被秘密杀害。其中不仅有所谓闹分裂的领头人之一何孟雄,还有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为鲁迅所痛惜的文化精英人物。东方旅社事件及其24名被捕者的被杀害,对中共无疑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对中共的一个更大的打击,还是在4月下旬及其之后的一段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时刻。

4月25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的特务所捕获。这位工人出身,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经在莫斯科受过专门培训、在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被认为是精明强干的中共领导人物，被捕后未经任何严刑逼供，就叛变投敌，并决心用出卖共产党的大量核心机密来换取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重用和奖赏。

多亏周恩来的远见卓识，早在两年前就已经部署了一项对付当时国民党唯一的特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措施：派遣情报干部秘密打入了调查科的内部。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的消息，就是由打入调查科内部，并当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利用职务之便，抢在敌特机关行动之前将这一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共中央特科，从而为中共中央采取反措施赢得了必要的时间，这才避免了国民党特工机关和顾顺章联手“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和“一网打尽”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图谋。当徐恩曾亲率他的两位高级助手张冲和顾建中赶到上海，按照顾顺章提供的一长串的重要机密地址突然搜捕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和中央一批重要领导人物的住所早已人去楼空。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划下，中共中央重要机关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所，都已抢在徐恩曾的前面撤退转移了。

顾顺章的叛变，对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确实是一个严重打击。其破坏性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比顾顺章晚57天，即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原因在于，向忠发只是一个挂名的总书记，并没有掌握多少实权。他所知道的核心机密也有限。处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善后事宜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和向忠发有直接联系的人转移一下就行了。而顾顺章却是一个握有很大实权、掌握着中共中央最多核心机密的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精明过人，素以沉着冷静著称的周恩来在听到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着实感到震惊和愤慨，并且据说是“痛苦万状地叹了口气”。

周恩来的震惊和痛惜，大抵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顾顺章原是

南洋烟草公司的产业工人,经过中共的长期培养,又经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事件的严峻考验。这几年一直受到周恩来的重用并已成为他的一位重要的助手。顾的叛变首先是对周恩来个人的一个打击。二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自1928年春天建立以来,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艰巨努力和磨砺,好不容易地形成了现在这样较为完备的规模,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有力的作用。现在,由于它的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特科组织可以说是面临瓦解的局面:原机构的所有重要干部及其活动场所乃至活动的方式都必须立即进行重大的调整与重新部署。鉴于顾顺章的教训,此后在用人和工作方法上都必须有一些新的思路,采取若干新的措施,以便使中央特科这个中国式的“契卡”——中共中央机关的一只“铁拳头”能够在短期内恢复活力、正常运转并发挥更大作用。

顾顺章事件发生后,虽然王明、博古这些人对周恩来等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用人不当”颇有微词,但他们除了空喊几句“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外,是什么实事也办不了的。重新组织中央特科的重任,仍然落在了周恩来这位任劳任怨的真正革命家的肩上。

1931年5月,在顾顺章事件发生后的很短时间内,经过周恩来的周密策划与安排,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改组重建,并立即投入了工作。

改组后的中央特科任务未变,仍以“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等为其主要职责。但它的领导力量却是更加充实和加强了。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原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康生)、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三人被挑选担任了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特科总部下设四科:第一

科为总务科,负责财政、交通以及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由陈云兼任;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查、反间谍等任务,科长由潘汉年兼任;三科为行动科,又称红队,负责镇压叛徒和除奸任务,科长由康生兼任;四科为通讯科,负责电讯联络任务,科长仍由李强担任。

在这个新组建的特科领导班子中,陈云的资历最老、实际斗争经验也最丰富。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已是中央委员,调他出任特科的主要领导无疑是很合适的。康生出身于中共实际控制的上海大学。1925年起就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等职,并且显示了很强的组织工作能力。当时已是中央组织部长。他被选调到中央特科参与领导工作,并兼管红队,也是顺理成章的。唯有潘汉年被选调到中央特科参与领导班子工作多少有点令人(也使他自己)感到意外。

潘汉年是个文化人,是个书生。他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村一个已经衰落了的书香世家。自幼就聪明好学,学业长进很快。16岁初中尚未毕业,因家庭经济窘迫便辍学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先后在家乡和县城的几所小学任教。凭着他的聪颖天资和努力勤奋,17岁那年便在宜兴教育界崭露头角,一连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专刊上发表好几篇研讨小学教学方法和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的文章,受到了包括“学灯”主编张东荪等教育界名流的注意。与此同时,由于受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影响,他又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也是在17岁那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的副刊上陆续发表了新诗、散文和童话作品多篇,表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追求与才能。1925年,19岁的潘汉年从家乡宜兴到上海闯世界。起初是在中华书局的《小朋友》编辑部谋生,第二年(1926年)春天便正式加入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先后参加编辑或主编刊物数种,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尖锐泼辣、战斗色彩很浓的散文与政论文

章。从而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在此期间,他因参加中华书局的罢工以及为营救创造社出版部同事被捕所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而引起了中共党组织的关注。1926年冬天被吸收加入了中共。1927年春,他受郭沫若、李一氓的邀请,前往南昌参加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的《革命军日报》主编。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数年之内,主编或与人合编刊物多种,同时发表了散文、小说多篇(部),成了文坛上的一位活跃人物。由于他的思想敏捷,性格开朗,对人直率真诚,在文化界颇有人缘,因而从1928年起就被党组织调到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先是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担任文化党组书记,后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挑起了团结党内外进步文化人、积极推进革命文学运动发展的重担。1929年,他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为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茅盾之间因开展革命文学口号的论争而引起的矛盾与隔阂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促进了整个左翼文学运动队伍的团结和联合,终于在1930年的春季和夏季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及其一系列分支机构。此后,他又代表中共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其他许多的如“社会科学家联盟”、“自由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著名团体。1931年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总之,潘汉年在进入中央特科之前,一直是个文化人。其活动范围基本上限于文化艺术界和宣传工作领域。工作的性质与工作环境养成了他的许多文化人的品格特点与精神风貌。

但是,当组织上调他进入中央特科这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保卫机构工作时,却向他提出了一些先前不曾有过的特殊要求:要求他对特科的组织机构和所有各项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守秘密,不得向特科以外的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要求他把自己真正隐蔽起

来,切断和外界一切联系,首先是切断和那些半公开的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自己的住处和行踪都要保密;还要求他尽量不要抛头露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与过去朋友们的往来。如果在某些场合不可避免地和过去的熟人碰见时,就要把自己的面目尽量扮演得灰色一些,给人以不明究竟和已经落伍了的印象,等等。

从潘汉年的个性与内心愿望来说,他对于上述这些特殊的要求是并不乐于接受的。他在文化人的圈子里活动多年,相对而言是自由随便惯了。他既擅长交际,朋友也自然很多。现在要求他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习惯,甚至改变性格,自然是极难的。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许下过要为党而献身誓言的革命者,又是处在那样一种敌我斗争极其尖锐残酷的环境里,他对于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以及相应提出的那些特殊要求,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于是,服从革命需要,服从党的要求,成了他的思想支柱和行动指针。他立即走马上任,成了中共最早的特工机构的领导成员之一。

1931年五六月间,当潘汉年离开文化宣传工作岗位转入中央特科之后,他在朋友众多的文化界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他原先的那些朋友和同志们再也难得见到他。就像他的老朋友、和他曾经同在一个支部里活动过的著名作家楼适夷所描述的那样:那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有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

新建的中央特科总部办公地点,设在当时的五马路(今广东路)的一个写字间。以一家煤球制造厂的名义作掩护。为了符合实际,真正起到掩护作用,由潘汉年出面在中山路找了一处厂基,并购买了机器设备,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以及总部秘书谢德钊到总部办公室碰头汇报和决定日常工作。